

桐庐民国往事 (四)

董利荣

故乡故人

民国时期，桐庐也有多位本土名人。《桐庐县志》入编的传略名人，其中有两位介于晚清与民国之间，在前一篇中提及姓名，在此略作介绍：

第一位臧承宣(1868年~1943年)，字益荪，号茹荪，别号桐江樵叟。分水庵坞村人(今属百江镇)，晚年移居桐庐。他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举拔贡后，晚清时期即出任分水县学堂堂长、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堂堂长等职。他倡导、推进新学，主张“以国粹为精神而参之以欧化”，“究东洋西欧之发达，研声光化电之机微”；提倡“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者并重”。在地理教学中，他将全国山脉、河流、州县名称及概况，编成歌诀付印，学生易读易记。民国元年，臧承宣任桐庐县署佐治员，后去广东连县、连山县任教育科长。1920年~1937年，曾两度执教之江大学，主讲先秦及两汉文学。承宣熟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，娴习诸子百家著述，讲课时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，学生十分信服。

由于臧承宣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曾负责纂成《分水县志》，因而民国12年~15年，他因邀参与编修《桐庐县志》。又于1931年主修《分水县志续集》。

臧承宣与族弟臧槐(晋三)皆以诗文著称，有“益荪文章晋三诗”之誉。著作有《楠华室文稿》《槐叟诗草》《桐庐风土志》《桐江诗综》《桐江百咏》等。

第二位胡传泰(1877年~1935年)，字奏平，在城镇(今桐君街道)人，清末附生。戊戌变法后，接受“新政”思想。胡传泰十分重视教育，清朝末年即与其弟胡传铿出资开办私立裁成两所学堂。民国二年(1913年)作为县教育会会长的胡传泰会同叶恩燧，创办桐庐县立女子高等小学，并附设国民学校。胡传泰任校外经理，亲手筹划建筑事宜，筹措办学经费。桐庐县立高等小学(校址在紫霄观，即桐庐中学旧址)附近无清洁水源，胡传泰有意打井一井，苦于经费短缺，其母得知后慷慨捐资260金，善事终成。此井也得名“胡母井”。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桐庐中学读书时，胡母井就在教室旁边，井水依然清澈。井栏上镌刻的“胡母井”三字还很醒目。后来我回桐庐中学当老师的时候，学校为建操场，把胡母井填埋了，现在想来，实在可惜。

桐庐县档案馆珍藏的民国《桐庐县志》，胡传泰是监修。

胡传泰擅长书法。晚年改用鸡毛笔书写，称“鸡颖书”，字体别具一格。

2008年我们赴南京袁振藻家看望时年112岁的胡家芝，家中书房即挂有胡传泰的书法作品。胡家芝是胡传泰女儿，袁振藻则是胡家芝长子。

《桐庐县志》入传介绍的其他几位民国桐庐名人是：

抗日烈士——邵明贤。

邵明贤(1903年~1940年)，字辅华、又字闻言，分水百新乡(今百江镇联盟村)人。早年在家乡教书，后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，毕业后历任国民党分水县公安局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，瑞安、嵊县公安局局长，江苏省江宁县、贵州省紫云县长等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满怀救国之志。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奉命潜入南京汪伪政府，从事刺探情报工作，在南京明瓦廊住宅内设置电台，将敌伪情况密报重庆。后被汪伪宪兵侦知，于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11月9日被捕，12月17日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。1932年，国民政府追认他为抗日烈士。

邵明贤在狱中曾赋诗二首，抒发其壮志报国的情怀。其一是：“世道崎岖暗暗伤，和平奔逐亦茫茫。长风万里空无迹，莫待时人笑老郎。”

“刀与笔”的战士——姚思铨。

被冯雪峰称为“献身于抗战的和革命的新文艺工作者”姚思铨是原白鹤乡板桥(今江南镇凤鸣村板桥自然村)人。姚思铨(1915年~1943年)，笔名万湜思，从小聪明好学，人称神童。1931年考入杭州师范学校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投入救亡运动，联络进步同学共同组织“白煤学社”，立志燃烧自己，贡献光热。同时秘密组织读书会，向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。1932年12月，姚思铨被捕，半年后经保释出狱。自此，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。

姚思铨酷爱文学、美术，自学英语和世界语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，当时23岁的他就翻译了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20首，题名《呐喊》。

1937年冬天，杭州沦陷，姚思铨转到金华。先后主编《大风》《新力》《浙江日报》副刊《江风》等报刊，经常登载左翼作家的作品，发表抨击和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，报道抗日根据地及进步文化界的动态，向读者传递光明信息。

姚思铨还自学木刻艺术，拿起木刻作品武器投身抗日。1938年，他讴歌抗日救国的版画集《中国的战斗》问世。1939年，他与野夫、金逢孙等在金华成立了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，被选为副社长。

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12月，姚思

铨在中共地下组织代表邵荃麟的指示下，联络项荒途、野夫、张乐平等东南文艺界知名人士，创办了《刀与笔》月刊，姚思铨担任主编。尽管《刀与笔》仅出4期，即被反动当局勒令停刊，但此刊显然已经真正发挥了刀与笔的作用。

1943年12月28日，积劳成疾的姚思铨与世长辞。但他的译著和木刻作品却永存于世。

革命烈士——潘芝山。

潘芝山(1900年~1946年)，名怀升，四管乡雅坊(今新合乡雅坊村)人。民国6年(1917年)秋，考入浙江省体育专门学校，因参加“五·四”爱国学生运动被开除。1919年春，结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金焕善，立志献身革命。他以“金兰结义”的办法，联络受苦弟兄，向地主豪绅开展减租斗争，并为革命筹集经费。是年5月，他集合农民武装40余人，打算配合党领导的其他武装，攻打诸暨县城，因事机不密，遭省防军伏击，暴动失败，潘芝山避匿湖州。后为侦探发觉被捕，押解至杭州拱宸桥。他伺机脱逃，避居无锡。1924年返回故乡。

民国29年(1930年)初，在共产党人蒋忠领导下，潘芝山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。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2年初，组织钱南支队第三独立中队，任中队长。队伍成立不久，在诸暨上施村(现属浦江县)，遭国民党挺进队袭击，队员只得分散隐蔽。半月后，潘召集散失人员20余人，去苏北参加新四军。

1934年6月，中共路西县平湖区署在马剑成立，潘芝山任区中队长。在浦江县寺前、中余一带开展征粮和“二五”减租，发动群众支前。1934年冬，区中队奉命北撤，潘芝山与区长毛冰山、县大队负责人蒋忠留下坚持斗争。1935年9月11日，遭潜伏在村的桐庐警察局巡长毛润庆枪杀，年仅46岁。

潘芝山生前在村里办学校，为当地百姓从地主潘时亮手中夺回宗祠产业，帮助雇农潘忠化成亲等事，在当地传为美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被迫认为革命烈士。

另外，与叶浅予合著《富春江游览志》的周天放(1895年~1941年)，系桐庐深澳人，曾任桐庐县民众教育馆馆长。先后任《上海晨报》编辑，《东南日报》记者，《桐庐民报》总编。《富春江游览志》的文字部分，即由他执笔完成。

遗存寻踪

民国时期的遗存，就较为丰富可观了。桐庐县85处文物保护单位(其中省级11处)，民国时期或与民国相关的共有15处。

这些遗存主要是建筑类的，如位于富春江镇俞赵村的嘉欣园，还是省级文保单位。“嘉欣园”三字由康有为题写。这座建筑建成于1924年，整体园区占地1900余平方米，建筑布局既有中西文化内涵，又有江南特色，现存建筑包括园门、嘉乐堂、三慈桥等。如今嘉欣园已辟为廉洁文化馆，使这座百年前的建筑品焕发新的生命。

位于富春江镇茆坪村的文安楼，可以说是我的访次数最多的民国时期的建筑物。此楼主人胡儒艺，当年通过经营竹木柴炭家境渐趋殷实，于是请来东阳建筑师建造此楼。自1922年动工至1925年告成，耗资3万多银元。之所以取名文安楼，门额上“派衍文安”四字即为答案，意为胡氏一族源出湖南文安。

文安楼的建筑风格中西结合，尤其正面格调独具特色，规整大气。在小山村有如此规模的民宅，的确罕见，难怪当年叶浅予先生称赞它是“江南第一农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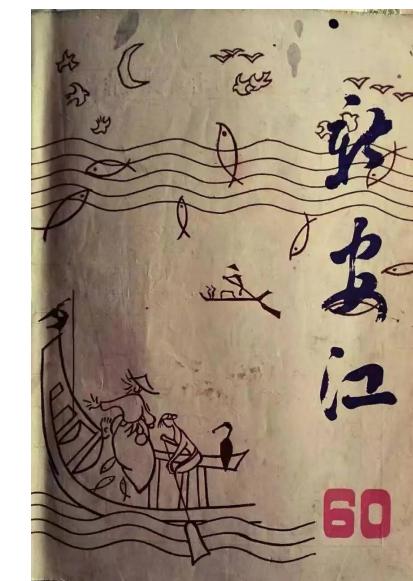
座落在莪山畲族乡山阴湾村的李氏花厅，堪称莪山唯一的古建筑。二十年前为编《桐庐古建筑》一书，我与保尔兄专程前往考察，我惊讶于这么一个山区小村居然建有如此大规模的建筑。所谓花厅，其实就是李氏宗祠，是民国十五年(1926年)村民李金寿投资建造的。花厅内建有一个戏台，厅内雕刻精美，弥足珍贵，而更珍贵的一面墙上绘有巨幅壁画，是畲族图腾，一匹龙麒，回首傲立，雄健而不屈，象征着畲民山哈的独特个性。

另外，深澳、环溪、荻浦、石舍等古村落，都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物，都是民国记忆的最好物证。

桐君山半山腰游步道旁有一方民国时期的摩崖石刻，内容为：“江山一览。己未重九偕王君霁亭同游。杭州王潜楼题，王墨林镌。”书写者王潜楼(1871年~1932年)是“中国最后一位宫廷画师”。这方石刻记录了王潜楼晚年回家乡杭州创办西泠书画社之际，于“民国己未重九”即1919年重阳节，偕友人来桐庐同游桐君山之事。尽管他们在此一览江山已过去一百多年，但这方石刻文字，仿佛让这件民国往事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民国末年即1949年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民国时期真正成为往事，历史开辟了新纪元。“古桐江山”从此迎来新的生机与活力。一代代桐庐人、新桐庐人和一拨拨外来游人，在桐庐尽情领略日新月异的城乡风貌，不断书写“江山一览”的华美篇章。

兰石斋杂记(十二)



书架上一直摆放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几本所谓的“内部刊物”，每次面对，思绪万千。

《新安江》杂志：该杂志是建德县文联刊物，(当时还没有撤县改市)相对于周边其他两县，当时在文学艺术上还是在前列的主要原因是，建德曾经是地委所在地，当时在严州府所在地梅城镇就有“严州师范学校”“浙江省冶金学校”“严州中学”“梅城高中”等教育机构。县城白沙镇有“浙西电力技校”。其中“浙江省冶金学校”面向全国招生，“严州师范学校”“严州中学”两校校龄均已百年，在浙西影响颇大。学校有些好的老师对当地有影响，带动当地的各方面进步，其他的不说，就文学艺术有影响的略微举几位：严州中学有夏承焘先生、柯秉铎先生。就读过该校的有画家吴茀之、《人民日报》社长邵华泽、上将徐永清、文学家郑秉谦等。特别是严州师范学校有美术教育家寿崇德先生夫妇，对建德美术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、功不可没。浙西电力技校

有陈必武、周膺在书法及书法理论上当时领先于前。陈必武先生的理论文章当时在上海《书法研究》杂志上经常发表，影响颇大。(《书法研究》多年前停刊，前几年复刊，不知还能不能达到以前的辉煌。)所以当时的建德文联不缺少作者，在一九八九年《新安江》杂志就已出到六十期了，是当时资料极度匮乏的本地文学艺术爱好者翘首以盼的精神食粮。在这一期上我发表了三方习作，那时十八岁，顺带说一句：当时用“兰”而不是“蓝”，不是编辑的错，而是本人无知，对文字的理解，农村当时因为文字改革后，通用简体甚至更简化的字，造成用字混乱。直到有一次请恩师寿崇德先生为我题印屏时，先生跟我说畲族姓应该写“蓝”而不能写“兰”，我才明白还有一门学问叫“小学”(文字学)。往后也就特别注意用字的规范。至于改革开放后，港澳台涌进大量繁体、异体字使人无所适从，文字(文化)的断层带来的纠结和精华、糟粕的区别没有定律。现在社会上很多公共场合还在乱用繁体字，对分不清繁、异体字的乱象也只有徒生感叹了！

那年高考

徐红霞

又到一年高考季，每到此时，40多年前那次终生难忘的高考，便会恍如昨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这一生曾参加过两次重要的考试，第一次是1979年从三合中学“高中”毕业时参加的初中中专考试，之所以在高中这两个字上加引号，是因为我们那一届从进入三合中学开始就准备考初中中专，高中的课本基本没学过，发的毕业证书却是高中的。所以我这个高中生是个名副其实的冒牌货。我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于三合公社大联大队境背自然村的学校，学校的地址设在阳明庙。我天生喜欢语文，讨厌数学，初中中专考的科目是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。五门功课中后面三门学科是我的短板，都说短板决定一个桶能装水的量，所以名落孙山对于我来说是铁定的事实，纯粹只是陪着同学们打了一次酱油而已。

跳不出农门，只能回家修理地球，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参加集体劳动，遇上雨雪天，就不用出工干活，想着时间就这样浪费了挺可惜的，就去江北的新华书店买几本书来看，进了新华书店才发现不知道该买啥书，上初中时比较喜欢英语，就买了两本英语书(上下两册)，每一篇课文都有练习题，书本后面还有对应的正确答案。见书架上有一系列我感兴趣的《古诗词阅读和欣赏》，足足有10多本，因为囊中羞涩，只能选一本，随手翻到一本里面有一篇是南北朝时期吴均写的《与宋元思书》，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，从小在富春江边长大，对母亲河有着天然的亲切感，就买下了这本书。因为写得太好，就把这篇美文背了下来，由于平时读书太少导致了孤陋寡闻，直到2012年有幸加入县作协才知道，当年的那本书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居然把“朱”错写成了“宋”。

开学第一节是语文课，教语文的臧仕瑞老师是个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，学习碧野老师写的《天山景物记》，下课时臧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家乡景物记》。我写了富春江的美景，文中引用了《与朱元思书》中的“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里许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……”第二天的语文课上，就被臧老师指定为语文课代表。

第一堂英语课后，发现自己简直就是英语小白，能进校门实属侥幸。班里有些同学是已经读过英语补习班的，其他同学在高中期间都学过英语。如何才能快速地提高英语成绩，除了发奋努力别无他法。我们女生的寝室和教室仅一墙之隔，为了方便同学们学习，教室夜晚从来都不锁门，每一天教室的日光灯都是由我开和关的，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和同学们请教，学英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词汇量，我从仅有生活费中挤出7元钱，买来一本

伤心至极？

离高考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，(80年代高考时间是7月份)，考高中中专的科目：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；考大学要加考历史和地理。学校决定同学们去留自便，老师也不再上课。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，有几个同学做了英语代课老师，只有极少数同学留了下来。我不甘心就此罢手，废寝忘食了整整7个月，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于是借来了高中的历史和地理课本，把最后的三个月全部用来自学历史和地理。明知又将是一次滑铁卢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考场。高考成绩出来了：英语77分(总分100分)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也是我发愤图强的最好见证。语文68分(总分100分)，感觉作文无从下手，都不知道写了点啥。

那年高考后，我经常做一个内容相似的梦，梦见自己在考大学，但题目太难，急得哭出声来，多少次午夜梦回，潸然泪下，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以至于在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校门时(81年杭州大学英语系英语单科的录取线是75分)，却被命运之手无情地拽回原点，在底层的烂泥潭中跌打滚爬，历经九死一生。81年下半年，有同学去毕浦中学继续补习，后来一个个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而我在高考后第二天就和邻家小伙伴方春梅一起去工地搬砖。没能进大学成了我今生永远的痛，常常感叹自己时运不济，怨天尤人，直到几十年后被史铁生的文字治愈。

史铁生从小就是“別人家的孩子”，但命运从未偏袒过他，“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”，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要终身与轮椅为伴，这巨大的打击让他彻底绝望，曾多次自杀，幸而被救。在明白了死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后，他开始思索如何生存，接受自己的命运，凭智慧的悟性走上了

命运的救赎之路。这个有钢铁般意志的巨人，21岁双腿瘫痪，接着败血症、尿毒症又缠上了他，每周靠透析三次维持生命，与病痛搏斗了38年，自嘲“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在写作”，尽管命途多舛却始终对生活和生命心怀感恩，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自尊自强，不仅著作等身，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等大奖。多部作品被译为日、英、法、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。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，用一生完美地诠释了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！

“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！”“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，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，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，唱支歌给你听！”“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‘更’字。”“人有一个坏习惯，记得住倒霉，记不住走运，这实在是有失厚道，是对神明的不公。”“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！”每一次读史铁生的文字，都会被那字里行间的坚韧和顽强毅力所震撼，被那直面苦难、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。是那些睿智的文字照亮了我的内心，教会我给心灵卸下沉重的枷锁，不要钻牛角尖，对过去不要耿耿于怀，面对命运的安排，不要抱怨，要与命运和解并学会释然。

灵隐寺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：“人生哪能多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！”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不完美才是真正的人生。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：“只有活在当下的，才是最幸福的人！”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，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。

蓝银坤

新安江